

一九四九年六月，张治中发表了与蒋介石政权彻底决裂的《对时局的声明》后，毛泽东与他有过这样一次谈话——



「我们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的联合政府，请你也参加」
「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
毛泽东笑道：「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起，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与毛泽东 张治中



乔东光 著

北京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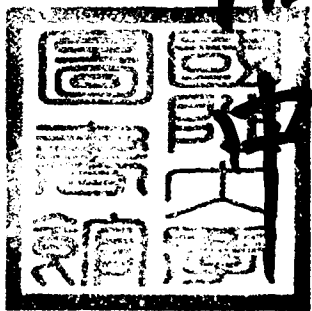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4 7599 1

毛泽东

与
張
治
中



乔东光 著

北京出版社

目 录

一、黄埔、西安,毛泽东与张治中两次失之交臂	(1)
○毛泽东到黄埔讲演,张治中赴北伐途中.....	(1)
○毛泽东派林彪赴西安与蒋介石会面	(5)
○击退国民党反共高潮后,毛泽东主张用政治方式解 决国共关系问题,张治中受命参加多次会谈.....	(16)
○赫尔利斡旋国共和谈,毛泽东四次接待,张治中等 提出反建议的提案	(30)
○1945 年 1 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周恩来到重庆多次 与张治中等会晤	(40)
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张治中三到延安	(46)
○日本投降后,在张治中等人的积极活动下,蒋介石 三邀毛泽东赴重庆	(46)
○毛泽东飞抵重庆,张治中热情接待.....	(52)
○国共双方代表彼此交换意见	(58)
○共同商谈实质性问题	(60)
○赫尔利从中作梗,毛泽东拜访社会各界名流.....	(71)
○会谈取得进展,张治中对毛泽东说,不发表《会谈 纪要》不行.....	(74)
○张治中举行欢送毛泽东的宴会	(77)
○“双十协定”正式签字	(81)
○张治中护送毛泽东回延安	(83)

○张治中第三次到延安,毛泽东说,将来也许你还 要回到延安	(87)
三、张治中营救新疆中共人员,毛泽东表示热诚感谢	(99)
○中共提出释放新疆被捕人员	(99)
○经张治中力争,蒋介石同意释放中共人员	(102)
○张治中精心筹划,做好护送中共人员的准备工作...	(105)
○中共人员平安抵达延安,毛泽东亲切慰问他们	(109)
四、北平和谈与张治中的新生	(113)
○毛泽东提出八条作为谈判的基础.....	(113)
○张治中率代表团到达北平.....	(122)
○毛泽东会见张治中,感谢在重庆时对他的热情接待	(125)
○毛泽东希望谈判成功,张治中规劝蒋介石出国	(126)
○中共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	(129)
○按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阐述协定最后修正案	(136)
○国民党拒绝《国内和平协定》.....	(143)
○毛泽东写信说,国民党和谈代表签字后不能回去。 张治中和代表团成员留居北平.....	(147)
○张治中发表对时局的声明.....	(153)
五、受毛泽东嘱托,张治中为新疆和平解放尽心尽力	(157)
○张治中电告陶峙岳等维持新疆政局,准备起义	(157)
○陶峙岳、包尔汉积极活动,毛泽东派邓力群与 他们联系.....	(161)
○新疆军政先后通电宣布起义.....	(169)
○张治中与毛泽东敞谈新疆的前途.....	(171)

六、肝胆相照,共振中华	(174)
○参政议政,做共产党的诤友	(174)
○为实现祖国统一,张治中多次给台湾故旧写信	(182)
○毛泽东回信评价张治中的《六十岁总结》.....	(189)
七、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	(195)
○踏上南巡的旅途.....	(195)
○关心各地工农业生产.....	(198)
○开怀畅谈,如处春风化雨之中	(216)
八、“文革”中张治中病重,毛泽东派人送去东北人参	(225)
主要参考书目	(229)

一、黄埔、西安，毛泽东与 张治中两次失之交臂

● 毛泽东到黄埔讲演，张治中赴北伐途中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的主持下，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选举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林伯渠（即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这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良好开端，开创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为了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国民党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1924年5月，军校开学。11月，周恩来到校担任政治部主任。12月，张治中到校担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的总队附、代理总队长。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生于1890年，安徽巢县人，出身在贫穷的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凭着个人的努力，他从学徒开始，当警察，进保定军校，再入黄埔军校，走上了军旅之途。

周恩来与张治中相见如故。周恩来的为人热情、谈吐风度

和学识牢牢地吸引住了张治中，使张治中对共产党员有了初步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治中与周恩来、恽代英、熊雄、高语罕等之间相互往来密切，与共产党的观点日趋相同。正像他自己说的，“到一九二五年夏，我已经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我的言论和态度，都大为右派所看不惯，因被认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①这时候，张治中已经担任黄埔四期军官团团长。

1925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中常委的有关会议和工作，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没有与张治中相识的机会。1926年9月3日，毛泽东还到黄埔军校讲演过一次，张治中正在北伐去武汉的途中，他们没有能够见上面。

虽然毛泽东不曾相识张治中，但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国内政治局势骤然逆转，共产党和国民党分裂成为两个敌对阵营后，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对张治中的了解却从未中断过。

首先，中国共产党对张治中的“和平将军”的美誉表示肯定。张治中在国民党集团内的地位不断攀升，但他却是一位握有重兵而从未与共产党军队直接对抗的将军。抗日战争时期，张治中主动请缨，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5军军长，第9集团军总司令，两次率军与日寇在上海作战。后来，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驱动下，张治中不得不放弃上海。当蒋介石要张治中率军队去和红军对垒时，张治中立即毅然交出了军权，表示宁愿去军校当教官。

对此，蒋介石一度怀疑，认为张治中同情红军，必通共匪。但调查一通之后，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后来见张治中身居要

^① 张治中著：《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职，从不揽权谋私，从不拉帮结派，蒋介石又相继委任他当湖南省主席、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直至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等职。

其次，在湖南任内，张治中开诚布公，与各界妥善相处，力求一切事情都有公平合理的解决。在一年又两个月的任期内，张治中居然使当地各派势力融洽相处相安无事。这使共产党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

但是，1938年在长沙发生的大火事件，却使张治中有口难辩，只好不置一词。实际上，火烧长沙是蒋介石下的命令。在这之前，武汉于1938年10月25日沦陷。蒋介石曾在沦陷前命令陈诚焚城，实行焦土抗战。由于陈诚执行不力，蒋介石很生气。蒋随后由南岳飞到长沙，召开包括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冯玉祥、张治中等在内的高级军事会议，提出长沙要实行焦土政策，在日本军队到来前，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11月12日上午，蒋介石又电令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下午4时，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酆梯、省保安处长徐权拟出长沙焚城计划交给张治中，张核定后叮嘱他们注意：“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实施；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张治中的预料。当地个别军警负责人轻信流言，在南城一处首先点火。其他各处军警见到火光，于是一呼百应，致使大火在长沙多处点燃，焚烧两昼夜，全市顿成焦土。起火的那天午夜，张治中从梦中惊醒时，火势已经蔓延开来，电话线路不通，无法挽救颓局。这时候他深知已闯下大祸，十分焦急。对这件事当时各方面，尤其国民党内一些顽固分子向张治中群起而攻之，倒是周恩来反为其解释，施之以慰藉。出事的第二天周恩来回城看到张治中的惊恐之状后，便细细问明详情，指出其责任所在。

张治中随即将以国民党中央部和政治部名义发布的《长沙大火真相说明》稿送请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后认为，国民党政府单纯军事抗战，不依靠发动群众，实施所谓“焦土抗战”的方针是错误的。他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对此事给予严厉的批评；另一方面又对上述文稿字斟句酌，进行多次修改，特别是对起火原因作了中肯的分析，除指出负责人误信谣言、准备不周、临时急躁外，还在两个地方加上“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以为敌寇将至，自焚其屋”等字句。对此，张治中由衷地感激周恩来，中共朋友能有这样的谅解态度，实在难得。后来张治中说：“他们对我亲切的同情，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①

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张治中感到很高兴。他是力主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更矢志不移，要用毕生精力去为它奋斗的。因为只有两党合作，革命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可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发生，使新四军遭受惨重的损失，导致两党关系又开始破裂，内战再一次扩大。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月13日令军令部拟具处理新四军的方案呈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于15日召集军委会议研究。方案分甲、乙两案，甲案主张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乙案主张不撤销番号，任其渡江北上，观其动态再作处理。讨论时，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首先发言，极力主张采用甲案。张治中则主张采用乙案，理由是：如照甲案处理，则将引起国共两党进一步分裂。现在大敌当前，半壁江山沦于敌手，内部分裂为形势所不许可。张治中和白崇禧原是保定军校同期、同班、同桌又同寝室的同窗，关系甚为密切。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分歧如此之大，在会上他们来回争辩，以至于面红耳赤，气氛十分紧张。张治

^① 张治中著：《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

中最后说，如果意见不能统一，可否将甲、乙两案同时呈上去？白崇禧随即拍案而起，大声斥责说，你身为政治部长，怎能说出这种话？张见白感情冲动已至极点，就不再吭声了。结果蒋介石采纳了甲案，于17日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诬称新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着将新四军番号撤销，还将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如此做法更加剧了国共双方的对立，使国家处于危亡之边缘。这就是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面对这一严重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这种做法赢得了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包括张治中在内的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倒行逆施，却使他们失去了全国的人心。在极端孤立的不利处境下，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接着，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双方重新坐到谈判桌前来。

● 毛泽东派林彪赴西安与蒋介石会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重新实现合作，形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入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战的新阶段。

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着争取民族解放的旗帜，领导着广大人民群众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使大量侵华日军陷入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坚持自己的独裁统治，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尽力观战避

实，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使抗战力量受到严重的削弱。

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国共合作，将抗战进行到底，对蒋介石集团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尽量支持国民党内外的爱国力量，使国民党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继续抗战，同时，又针锋相对地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进行斗争，粉碎他们的投降反共的阴谋。

在整个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随着抗战的进程和局势的变化，时而紧张地进行着，时而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国共谈判，是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治中之间进行的。

1942年五六月间，随着英、美、苏三国团结合作的加强，他们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美、英领导人反对中国国内发生内战，支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蒋介石的反共行为起到了约束作用。加之国民党顽固派军事反共遭到的失败，国民党政府财政和经济危机的加深，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不断增长，一些地方势力产生的离心倾向，中国共产党又一直坚持争取国共关系好转的政策，这些都促使国民党决策层开始谋求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放弃以往的军事进攻手段，改取政治解决的办法。

1942年7月21日，蒋介石在重庆会见周恩来，说已经重新指定张治中、刘斐与中共谈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蒋介石的联络参谋继续去延安。随后，国民党派到延安的联络参谋有陈宏谟、郭卫生、周励武等。在这之前，周恩来不仅派邓颖超拜访张治中，他还亲自会见了代表蒋介石来吊唁其父亲周懋臣去世的张治中，提出希望同蒋介石进行面谈。

7月31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提到这件事，认为这个安排是国共关系好转的征兆。

随后，双方继续磋商。8月14日，蒋介石再次会晤周恩来，表示想要好好地解决国内问题。周恩来也表示，愿与张治中、刘斐商量解决问题的途径。接着，蒋介石提出，他一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会面，请周恩来电告延安。

会晤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发电给毛泽东，报告了他同蒋介石会面的经过，分析蒋介石这次主动约见毛泽东的情况。周恩来认为，他“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在其初步解决新疆及回回问题之后，他又自己北上布置，其目的未可测。”^①为确保安全起见，周恩来提出两个办法：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介石一谈；二是要求蒋带周恩来到西安，然后由周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周恩来当时估计，前一个办法可以行得通，后一个办法不易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除非偕同出来的是朱德。

中共中央研究后，考虑采取周恩来提出的第一个办法。8月17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说：“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②

经一番思索后，毛泽东于8月19日晨致电周恩来，提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③

周恩来接此电后，同日复电说，现在与蒋介石晤面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去打开谈判之门。如蒋介石约林或朱来重庆，也可以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重庆。

^① 《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46页。

^{②③}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399、399页。

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与蒋介石的会谈还是先派林彪去，看看情况后再定毛泽东直接会晤蒋介石的问题。

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①

9月1日，毛泽东接见了来延安的联络参谋陈宏谟等3人。陈等表示蒋介石、何应钦、张治中、吴铁成均愿意与中共改善关系。为此，毛泽东向他们提出：（1）彼方释放叶挺，我方即派一人出席参政会，否则仍不出席；（2）我方决不推翻国民政府，决不越过现有疆界，彼方承认我方在敌后有发展权利，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至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互不攻击；（3）恢复新四军，发给欠饷，停止逮捕；（4）何（何应钦）停止反共，我停止反何，并可重新来往，但何若再反共，我必再反何。

3日，毛泽东又复电周恩来，重申他亲自会晤蒋介石的重要性，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②这里，毛泽东还有一个深层的考虑，即是他在后来一份电报中指出的，我们要从下面一个基点出发，即“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③

9月5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坚持认为毛泽东蒋介石的

^{①②③}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424页。

会晤，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其理由是：（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提到愿回延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以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周恩来在电报中还分析了局势对我方不利的几个因素：（一）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的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助，他们又反对中国内战；但何（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蒋介石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三）毛泽东为谋求改善根本关系，而蒋介石则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经反复磋商，毛泽东同意并采纳了周恩来这次提出的建议。蒋介石及张治中等与毛泽东会面的打算没有变为现实。

9月14日，林彪从延安动身。途中因山洪暴发造成的公路路面损坏，林彪到达西安时，蒋介石已经返回重庆。

10月7日，林彪抵达重庆。13日，林彪由张治中陪同会见了蒋介石。林彪提到毛泽东甚愿见蒋介石，惟适患伤风未来。蒋即问毛泽东好。林彪接着讲话，蒋介石对他前几段话还表示有兴趣倾听。但当他提到内战危险时，蒋介石便显得不耐烦了，频

频地看手表，最后约林彪在走前再谈。

16日，周恩来同林彪应约会见张治中。林彪说明，中共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军。他提出“三停、三发、两编”的要求，即：停止全国军队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张治中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不耐烦地将话头打断，建议林彪先同各方面多谈，然后再同他谈。以后，周恩来和林彪就与刘斐会谈，刘表示一切都可以谈，但要周恩来、林彪还得同张治中谈。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为了缓和谈判空气，向我党中央建议改变过去老一套的谈判办法，这次多谈一般原则问题，不涉及具体问题。毛泽东10月28日代表中央复电说，同意周恩来所提出的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的问题均不提。

同年11月12日至2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党的五届十中全会。会议确定了力求实现的三项目标：第一，“如何尽四强的责任”，如何达到“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第二，彻底检查党务工作，“必须使党务溶化于民众生活中”。第三，如何执行“经济第一”的政策。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国民党囿于局势的需要，不敢扩大反共事态，仍维持着“溶共、限共、反共”的局面。会上，特种研究委员会对共产党问题所作的专题报告宣称，对共产党仍本着宽大政策，冀其觉悟。还宣称，对共产党的合法活动，给予保证。

对于这次全会的评价，2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中说，全会通过的决议，“对于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于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地解决”。决议“表示了这

种解决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我们不出他们所设定的严格的范围，他们则答应和我们合作”。因此，双方“磨擦还会有，但方式会缓和一点。各地对于国民党人员应继续采取诚恳协商，实事求是，有理有节的态度，力戒骄傲夸大有害无益的态度，借以争取更进的好转”。^①

抱着使两党关系好转的愿望，林彪仍留在重庆，等待着与蒋介石的会见。经过安排，12月16日，林彪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林彪表示拥护国民党十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新精神。在谈到两党关系时，林彪要求彻底实行“三停、三发、两编”。蒋介石表示，国民党对统一团结问题不是政治手段，希望大家在政令下工作。他还说，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希望问题很快解决。药品答应发给。但不许再提新四军一事。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谈话后，林彪即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

12月24日，周恩来、林彪按照毛泽东18日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指示，向张治中提出四项条件：“甲、共产党合法化，国民党可到中共区域实行三民主义。乙、扩编四军十二个师。丙、行行政区，直属中央，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丁、战后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战前能做准备工作，保证战后完全做到。情况许可时，可磋商部队移动事宜。”周恩来还声明：如认为这些条件可以谈，就留重庆继续谈判，如果认为条件相差太远，请蒋介石提出具体办法，交林彪带回延安商量。张治中将这逐条记下后，答应向蒋介石报告。

30日，张治中打电话给周恩来，说他们已经开过会，认为共方条件相距甚远，还未作出决定。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5—416页。

1943年1月9日，周恩来、林彪再次同张治中谈判。张治中提出，中共所提四项条件同国民党中央的希望相距太远，与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相距也远。1940年10月19日何白皓电提出，要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內撤到黄河以北。当时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曾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同年11月9日电复何、白，据实驳斥了皓电的造谣，并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后来发生了国民党挑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对国民党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使国内局势趋向好转。这次，张治中个人意见认为，党与政府两项问题不大，但军队编为12个师太多，军队北移必须限期开动。周恩来答复他，所提四项条件与皓电精神并无不合，距离只在军队的数目和移动的时间。这次谈话未获结果。

随后，周恩来与林彪将谈话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并建议，为了顾及蒋方面子，在谈判中我方承认皓电为谈判基础，说明我们的四项办法同皓电精神并无根本不合之处。关于驻地的移动，请示可否以李先念部同山东李学恩的国民党部队对调，以便统一山东。

1月14日，周恩来应约同张治中谈话，张表示希望中共放弃军队。周恩来对此据理予以拒绝。

为了表示我党谈判的诚意，21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提议，准备采取以下两种办法结束这次谈判：

- (一)说明我方四条同皓电精神相符合，只是军队数目和移动时间有差别，如不同意，要他们提出对案，由林彪带回延安；
- (二)向他们直接要方案。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于2月8日复电，同意周恩来提议的前一种办法。